

# 辞书释义方法的演变研究

王恩旭<sup>1</sup>, 郭智辉<sup>2</sup>

(1. 济南大学 文学院, 济南 250022; 2. 曲阜师范大学 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 山东 曲阜 273165)

**摘要:** 辞书释义, 理论方法先行。纵观 2000 多年的辞书发展史, 释义方法大体经历了随文释义、同义词释义、“属+种差”释义、整句释义、模板释义五个阶段。虽然“属+种差”法是当前辞书释义最常见、最主流的方法, 但该方法在“属”和“种差”的确定以及同义词、多义词、新词的解释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研究表明, 模板释义法可以作为“属+种差”释义法的有益补充。

**关键词:** 辞书; 释义方法; 发展困境; 模板式释义

**中图分类号:** H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8039(2020)06-0001-10

释义是辞书中难度最大、学术含量最高的部分之一<sup>[1]</sup>。对于辞书释义的艰难,《约翰逊词典》1755 年第一版序言写道: 词的“意义如此松散和笼统, 使用如此含糊和不确定, ……时时发生着变化, 时时转换着关系, 无法在词典中弄清, 就像无法根据水中的倒影准确地勾画出在风暴中摇动的树丛”<sup>[2]序言</sup>。

解决辞书释义难题(工欲善其事), 理论方法必须先行(必先利其器)。没有科学的理论或方法, 不知如何去分析和描述词义, 词的意义永远像是“风暴中摇动的树丛”, 时时发生着变化, 时时转换着关系, 永远也无法在词典中弄清。相反, 有了科学的理论或方法, 知道哪些是词的意义哪些不是, 知道如何去分析和描述它们, 就能够突破词义含糊、不确定的局限, 逐步提高辞书释义的水平, 让辞书释义有法可依、有迹可查、事半功倍。

## 一、释义方法的历时演变

(一) 有词无义或随文释义阶段(公元前 2 世纪以前), 辞书释义的萌芽

在真正意义上的词典产生之前, 人们对词的解释是在难词词表(glossary)中进行的。聚焦难词, 忽略日常用词, 是难词词表的一个显著特征<sup>[3]29</sup>。编纂难词词表, 主要是为了解释经典中的难词。比如, 古印度人编写词表(公元前 10 世

纪)是为了解释《吠陀经》的难词, 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编写词表(公元前 5 世纪)是为了解释“荷马史诗”的难词, 修道士、小学老师等将字行间、页边注解文字汇编成古英语词集(公元 5 世纪)是为了帮助人们理解经文的难词。此时词表对难词的解释(如果需要的话)往往是随文释义式的, 即解释的不是难词固有的意义, 而是它们在经典上下文中的意义。

聚焦难词, 是西方早期词典编纂的重要模式, 也是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模式, 直到 17 世纪依然盛行于欧洲大陆。以英语为例, Robert Cawdrey 编纂的《字母顺序表》(1604, 收词约 3000 条)主要帮助理解从希伯来、拉丁、希腊或法语借来的难懂的英语词; John Bullokar 编纂的《英语词论》(1616, 收词约 6000 条)解释了大量医学、逻辑学、哲学、法学、天文学、纹章学(专科术语)等方面的难词。直到 1702 年, John Kersey 的《新英语词典》(收词约 28000 条)出版后, 这样的情况才有所改变, 英语首次出现了系统兼收普通词和难词的词典<sup>[4]49-55</sup>。

中国早期的辞书虽然也是以词表的形式出现的, 但和西方相比至少有三点不同。1) 编纂目的不同: 西方编纂词表主要是为了解读经典, 而中国编纂词表, 比如《史籀篇》《博学篇》《苍颉篇》《爰历篇》等, 主要是为了蒙童识字。2) 收词范围不

收稿日期: 2020-08-05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语词的模板式释义方法及释义模板库建设研究”(19BYY030)

作者简介: 王恩旭(1978—), 男, 辽宁朝阳人, 文学博士, 济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郭智辉(1979—), 女, 山西平遥人, 文学硕士, 曲阜师范大学教学研究与评估中心副主任。

同,西方早期的词表只收难词,几乎不关注普通词;中国词表为了蒙童识字的目的既收难词也收普通词,且难词的数量远低于普通词。以《仓颉篇》第一章为例(原稿亡佚,以下为后世学者复原稿)<sup>[5]</sup>:

苍颉作书智不愿。以教后嗣世  
□□。幼子承诏唯毋□。谨慎敬戒身即  
完。

勉力讽诵搏出官。昼夜勿置功  
□□。苟务成史临大官。计会辩治推耐  
前。

超等轶群□□□。出尤别异白黑  
分。初虽劳苦后必安。卒必有惠  
□□□。

恚愿忠信□事君。微密倓□天生  
然。儇倓□□□□□。

在第一章所列的105词中,绝大多数是较为容易的常用词(下划线部分),只有一小部分是难词。

3)从以往的文献来看,西方早期的词表可能会包含一些随文释义。和西方不同,中国的随文释义研究虽然历史悠久、成绩斐然<sup>①</sup>,但主要保留在经典文献之中,很少进入词表。换句话说,中国早期的辞书(词表)往往只包含词,不包含随文释义(比如上文的《仓颉篇》)。直到《说文解字》《尔雅》等真正意义上的辞书产生后,随文释义成果才逐渐进入辞书之中,并于清代达到顶峰。比如“苍”,《仓颉篇》只列字不释义,《说文解字》提供了简单的释义,《康熙字典》收录了历代有代表性的释义。

《说文解字》:艸色也。从艸仓声。

《康熙字典》:【说文】草色也。【易·说卦传】震为苍筤竹。【临川吴氏注】苍,深青色。【诗·王风】悠悠苍天。【礼·玉藻】大夫佩水苍玉。【疏】似水之苍而杂有文。

(二)同义词释义阶段(公元前2世纪—20世纪初),真正辞书释义的开始

同义词释义法是一种古老而又实用的释义方法。说它古老,是因为该方法从人类第一本词典产生之日起就开始使用了。比如,古希腊第一本词典《语词》(由古希腊著名语文学家阿里斯托芬斯(Aristophanes 前257—前187)编纂)主要用了同义词释义法,即用一个比较熟悉的同义词去解释另一个不太熟悉的词;中国第一本词典《尔雅》

(前200左右)用的也是同义词释义法,不过具体操作时采用的不是一对一而是一对多的释义形式,即用一个同义词解释一批词。比如《尔雅·释詁》第一条:“初、哉、首、基、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sup>②</sup>。说它实用,是因为它符合当时的生产生活需要,加以该方法具有简洁明了、易于操作、节省版面等优点,因此在世界语文词典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直到20世纪初,依然有很多词典以此作为主要的释义方法(比如1901年出版的《钱伯斯20世纪词典》就是如此)。

由于同义词释义法有着自身无法克服的缺欠,比如释义模糊、不准确,颗粒度较粗、无法区分词义的细微语义差别,容易造成循环释义等,因此近现代词典编纂者都有意识地限制或避免同义词释义。比如,西方学者提出了“避免循环释义”或“非循环论证”的原则<sup>[6][170]</sup>,中国学者郑奠、孙德宣等在1956年完成的现代语文词典编纂的纲领性著作《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中规定:“同义词互训只能作为解释的补充手段,不宜单用滥用”<sup>[7]</sup>。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学习型词典放弃了同义词释义法,改用短语或整句的释义方法,比如《柯林斯高阶英语学习词典》第8版、《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第5版、《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8版等。受此影响,规范型词典中同义词释义的比重也在逐步下降,以《现代汉语词典》1978年、1983年、2012年三个版本为例,同义词释义的比重从1978版的20.2%下降到1983版的19.8%,再降到2012版的18.9%<sup>[8][30]</sup>。尽管如此,同义词释义的比重仍然比较高(占20%左右)。如何解决规范型词典中的同义词释义问题,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①中国古代很早就产生了随文释义的思想,比如《孟子·万章》指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说,一个词在不同的上下文中可能有不同的意义,理解《诗经》如果拘泥于字词本身的意义,很容易误解诗人的本意,只有结合上下文去感受、推测诗人的本意,才能真正理解该词的意义、真正读懂《诗经》。该思想被后世学者所继承,唐代孔颖达在《诗经正义》提出了“观文势而为训”的观点,所谓“观文势”,就是考虑上下文的意义;清代学者段玉裁也一再强调对于经典字词应“随文解之”“宜随文而解”。为了满足不同情景下的随文释义需求,古代学者开创了传、笺、注、疏、正义、集解、通训等不同的随文释义体例,产生了《毛诗故训传》《五经正义》《尔雅义疏》《尔雅注疏》《说文系传》《说文解字注》《一切经音义》《故训汇纂》等重要的随文释义著作。所有的这些共同促成了一个专门性的学问——训诂学的产生。

②除了以上情况外,也存在用几个熟悉的同义词解释一个新词的情况。比如,Robert Cawdrey主编的《字母顺序表》(1604)就用“cast away, or yield up, to leave, or forsake”四个同义词来解释“abandon”。

(三)“属+种差”释义阶段(20世纪之后),精细化释义的开始

和同义词释义法一样,“属/genus+种差/differentiae”也是一种古老的释义方法,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亚里士多德指出,“定义由属和种差组成/the definition consists of genus and differentiae”<sup>[9]479</sup>,定义的方法是“先将对象置于其属内,然后再加上它的种差/the former of a definition should first place the object in its genus, and then append its differences”<sup>[9]471</sup>。其中,属是种的上位概念,种是属的下位概念,种差反映种概念和其所属概念的差别(即区别性特征)。以“椅子”为例,“坐具”是其属概念、上位概念,“椅子”是种概念、下位概念,“有靠背”是“椅子(种)”和“坐具(属)”之间的差别(种差);通过“……的……”将“有靠背(种差)”和“坐具(属)”语义组合在一起,得到“椅子”的基本意义“有靠背的坐具”。

理想的“属+种差”释义,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1)有科学的语义结构分析理论为指导。通过分析词的语义结构,弄清词义的构造成分和构造关系,在此基础上,建构“属+种差”释义模式。2)有系统的语义分类体系做基础。基于语义分类体系,确定被释词的语义类属及继承关系。比如“椅子”类属于“坐具—人造物”,可以继承“坐具”“人造物”的概念语义信息;“水”类属于“液体—自然物”,可以继承“液体”“自然物”的概念语义信息。3)辅之以具体的语义特征分析法。通过分析,概括种概念和属概念之间的差别,得到“种差”。比如“水”和“液体”的差别除了“无色、无臭、无味”外,还有“在标准大气压下,冰点0℃,沸点100℃”,这些都是“水”不同于“液体”的“种差”。

20世纪之前,已经有很多词典使用“属+种差”释义法。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如缺少系统的语义结构分析理论、没有完善的语义分类体系、缺乏具体的语义分析方法、缺少对客观世界的正确认识等,“属+种差”释义的质量普遍较低,不仅准确性不够、系统性不强,有些释义甚至是错误的。比如《新英语词典》(1702)将“狗/dog”解释为“一种动物”,只有属特征没有种差特征,对于理解“狗/dog”几乎没什么帮助;《盎格鲁—不列颠词典》(1708)将“狗/dog”解释为“一种众所周知的动物”,种差“一种众所周知的”非常笼统,不足以

将之和其他动物区分开来;而《尔雅》《集韵》将“狗”解释为“熊虎子”、《说文》《古今注》将“鲸”解释为“海大鱼”或“海鱼”,现在看来都是错误的<sup>①</sup>。

进入20世纪后,随着结构语义语言学、语义场理论、语义网络理论、概念依存理论、原型理论、框架语义学、生成语义学、认知语义学、生成词库论等的兴起,分析词的语义结构、提取词的语义特征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语义学以及词汇语义学研究成果,比如 Fillmore (1929—2014)的《框架语义学》、Leech (1936—2014)的《语义学》、Jackendoff (1945—)的《语义结构》、Lakoff (1941—)的《女人、火和危险的事物》、Langacker (1942—)的《认知语法基础》、Lyons (1932—2020)的《语义学》、Pustejovsky 的《生成词库论》、Talmy (1942—)的《认知语义学》、朱德熙的《语法讲义》、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王宁的《训诂学原理》、符淮青的《词义的分析 and 描写》、贾彦德《语义学导论》、陆俭明和马真的《现代汉语虚词散论》、沈家煊的《“有界”与“无界”》、袁毓林《论元角色的层级关系和语义特征》、张志毅和张庆云《词汇语义学》等;系统的语义分类体系逐渐建立起来,比如 Miller 和 Fellbaum 20世纪80、90年代建立的英语语义分类体系 WordNet、梅家驹和竺一鸣等编纂的《同义词词林》、董振东和董强研发的知网(HowNet)、苏新春主编的《现代汉语语义分类词典》、亢世勇主编的《新编同义词词林》等;新的语义分析方法不断涌现,比如义素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概念语义分解法、语义网络分析法、物性结构分析法等。

目前,初步具备了“属+种差”释义所需的基本条件,“属+种差”法日臻成熟,逐渐成为辞书释义的主流方法。尤其在学习型词典中,“属+种差”法已经占据绝对优势,成了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释义方法。比如,《小罗伯特法语学习词典》的“属+种差”释义占83.27%、《当代法语词典》

<sup>①</sup>有学者认为,古汉语辞书中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属+种差”法(比如义界法)。假如该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说的也是20世纪以后的事。因为,20世纪以前只有朴素的“属”“种差”观念,没有科学的“属”“种差”确定方法。1)一般认为,科学的“属”体系是在瑞典生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 1707—1778)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学的英语语义分类体系(即“属”体系)是在20世纪前后建立起来的,汉语的语义分类体系更晚一些,直到20世纪末才初步形成;2)尽管20世纪前的古汉语辞书有意识地描写了“种差”,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所提取的“种差”往往并不准确,而且数量也不够。

占 47.40%、《现代汉语学习词典》占 36.30%<sup>[10]</sup>。

(进一步讨论见第四部分)

(四)整句释义阶段(20世纪末),情境性知识进入词义

将被释词嵌入释义之中、以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解释词语并非《柯林斯 COBUILD 英语词典》(简称《柯林斯》)的首创,以前也有词典用过类似的方法。例如:

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尔雅·释水》释“河”

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玕琪焉;东南之美者,有会稽之竹箭焉;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尔雅·释地》释“珣、玕、琪、竹箭、犀、象”

Ancheggiare, is when a horse doth coruet with a quicke time, carrying himself altogether vpin his hanches. (扭摆,是指一匹马以齐步行进的步速腾跃,身子都支撑在后身上。)—《词语世界》(1598)释“ancheggiare/扭摆”

Saboter une chose, c'est l'abîmer pour qu'on ne puisse plus s'en server. (破坏一件东西是将其毁掉从而无人能使用它。)—《罗贝尔儿童小词典》(1988)释“saboter/破坏”<sup>①</sup>

但没有一部词典将该方法贯穿始终,也没有一部词典将之发展成为一种科学的方法。1987年,《柯林斯》出版,标志着整句释义法的诞生。例如:

【walk】When you walk, you move forward by putting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in a regular way. (当你走路时,你通过把一只脚放在另一只脚前面的方式向前移动)

【water】Water is a clear thin liquid that has no colour or taste when it is pure. . . (水是清澈的稀液体,纯净时无色、无味。……)

【destroy】To destroy something means to cause so much damage to it that it is completely ruined or does not exist any more. (摧毁某物意味着对它造成如此大的破坏,以至于它完全被摧毁或不复

存在)

和以往的释义相比,《柯林斯》有继承,也有所创新。继承主要体现在:解释词义核心部分方法和以往相同,仍以“属+种差”法为主、其他方法为辅。比如,walk 释义的核心部分 move...way(下划线部分)是“属+种差”式的,move 是属,forward by putting one foot in front of the other in a regular way 是种差;解释 water 也是如此,clear...taste(下划线部分)是释义的核心部分,liquid 是属,clear thin...that has no color or taste 是种差。创新体现在:

1. 利用整句释义,将被释词系统地置于真实的情景之中,是《柯林斯》最大的创新。以往的词典释义,多不包含参与者、时、体、态等信息,词义解释脱离词语的使用环境,显得不够真实。和以往的释义不同,《柯林斯》释义句都是从真实语料中选取的,被释词被置于真实的情景之中,释义不仅包含参与者信息,也包含时、体、态等方面的信息,这让释义显得更真实,也更贴近自然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整句释义的优点,诚如《柯林斯·出版说明》所说,“成功凸显出词汇在典型环境中的典型用法,释义本身即是绝佳的例证”。

2. 基于以往的研究(如 Wierzbicka<sup>[11]</sup>等),创建了自己的释义元语言(metalanguage)体系,将释义词控制在 2500 个以内,并利用这些释义词为不同类型的词语建构了各自的释义元语言框架。比如(X 表被释词):

名词:an X is...; if someone V + X; you/they...; if you are an X, ... you...; your X is...等;

动词:to X someone means to...; if you X something, you...; when something is Xed, ...; when you X, you...; someone who Xs...等;

形容词:someone who is X + V...; an X + N is; if something is X, it is...等。

释义时,根据被释词所属的类型不同,选用不同的释义框架。比如,解释 walk 用 when you X, you...框架;解释 water 用(an) X is...框架。

3. 建立了自己的语义分类体系(thesaurus)。不过该体系主要反映同义关系,基本不反映上下

<sup>①</sup>另外,《法兰西学院词典》(1694)、《不列颠词典》(1730)中也有整句释义的例子。

位关系。比如,在《柯林斯》语义分类网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thesaurus> 上输入名词 water,可以得到它的同义词 liquid, sea, 输入动词 walk 可以得到它的同义词 stride、travel on foot、escort、stroll、route、gait、path; 但却得不到 water、walk 的上下位词(因为没有标注上下位关系),因此无法知道 water、walk 的语义类属如何,也无法知道它们与哪些词有语义继承关系。

(五)释义模板阶段(兴起于近10年),从共性中寻找个性

“用一个模板解释一批词的意义”的思想早在2000年前就出现了。比如,《尔雅》中随处可见用一个词解释一批词的例子(比如“初、哉、首、基、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不过此时的释义都比较模糊,不够准确,而且没有揭示出词义之间的细微语义差别,因此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模板释义。为了让概念界定更加细致、精确,莱布尼茨(Leibniz 1646—1716)在亚里士多德研究(即“属+种差”)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创建“通用语言(general language)”的构想,并概括出了5条代数逻辑、4个定理,罗列了40个基本命题。从已经完成的50页定义和术语看,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不关注那些临时的、特殊的概念和用法,只关注哪些通用的、一般的概念和用法。例如<sup>[12]101</sup>:

【organism】An organism is a perfect natural machine, or one of which any part is a machine. (有机体是一台完美的自然机器,或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是机器)

【man】Man is a thinking animal, or is a thinking thing endowed with an organic body. (人是一个会思考的动物,或者是一个会思考的有机物)

【walk】to walk is to move oneself forward by foot. (走是用脚向前移动自己)

除了界定一般概念外,莱布尼茨还希望通过“通用语言”表达(express)数学、形而上学、科学真理等。虽然莱布尼茨从未严肃地考察过自然语言,其所提出的“通用语言”只是一种逻辑上的设想,但却深刻地影响到了后世的研究。具体表现在:1)其所提出的代数逻辑、定理、命题等直接影响了弗雷格、罗素、维特根斯坦等哲学家和逻辑学

家,开启了一个语义表示的数理逻辑时代。2)1935年,逻辑学家塔尔斯基(Tarski)在《逻辑科学语言中的真理概念》中区分了“对象语言”和“元语言”,前者是谈论语言对象以外的事物和对象的语言,后者是谈论对象语言的语言<sup>[13]</sup>。为弄清释义元语言的实际使用情况,词典学界展开了对释义元语言的研究工作,比如Wierzbicka的《词典学与概念分析》、Goddard和Wierzbicka合著的《词汇与意义:跨领域、跨语言、跨文化的词汇语义学》、张津和黄昌宁的《从单语词典中获取定义原语的一种方法》等。3)虽然目前已经很难看到莱布尼茨“通用语言”的原貌,但从弗雷格、罗素等沿着莱布尼茨所开创的数理逻辑道路来看,构建“通用语言”不只是为了界定概念,除此之外,还为了能以有限的代数逻辑、定理、命题等表达无限多的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说,“通用语言”是一套具有超强表达能力的公式或模板,通过这些模板,不仅可以界定自然语言概念,还可以表达数学、形而上学等领域的知识。

“用一个模板解释一批词的意义”,《现代汉语词典》编纂之初就有过类似的想法。吕叔湘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第85条指出:“同属一类的条目,注释措辞必须一致,避免分歧。”比如“亲属称谓,同类器皿,同类动作(烹饪、缝纫),等等”<sup>[14]</sup>。谭景春进一步概括为“同类条目释义行文要一致”,即同类词条释义应该使用相同的释义方式或释义模板<sup>[15]</sup>。以“老虎”“苍蝇”为例,它们称谓腐败分子时属于同类词,《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用一个模板来解释它们,即“比喻/特指+职位高/不高+的+(严重)+腐败分子”。

【老虎④】特指 职位很高的 严重腐败分子。

【苍蝇②】比喻 职位不高的 腐败分子。

虽然“用一个模板解释一批词的意义”的思想早就出现了(近期可追溯到《〈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稍远一点儿可追溯到莱布尼茨的“通用语言”,更远一些可以追溯到《尔雅》),但一直没有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解决汉语词的释义问题的“释义模板”,最近几年才出现。陈振宇和袁毓林<sup>[16]</sup>等构建了汉语亲属关系自动推理模型;魏雪和袁毓林<sup>[17]</sup>构建了名名组合的释义模板;王恩旭和袁毓

林讨论了释义模版的建构过程及建构方法,指出构建名词的释义模版适合从物性结构入手,构建动词的释义模版适合从论元结构入手,构建形容词的释义模板适合从搭配对象入手等<sup>[18]</sup>。例如:

【椅子】 X 是……, X 是用来……,  
(语义类) (功用角色)

X 由……构成。(X 表被释词,下同)  
(构成角色)

【走②】 人或鸟兽 用… 在…  
(施事) (工具) (处所)

以…方式 向… 移动。  
(方式) (方向) (语义类)

【薄①】 物体的 …… (方面) ……。  
(实体) (属性) (属性值)

研究表明,建构释义模版不仅有助于机器自动释义和自动推理,也有利于解决辞书释义不完备、不准确等问题。

## 二、辞书释义的发展困境

### (一) 理论上的困境

词典释义,理论先行<sup>[19]</sup>。2000 多年的辞书发展史证明,词典释义的每一次重大进步,都离不开语言学理论的指导。没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就没有科学的词源研究,也不可能诞生《德语词典》(1838—1960)、《牛津英语词典》(1858—1929)这样不朽的著作;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兴起,为词典释义送来了语义结构分析的思想;随后出现的语义场理论、义素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语义分类体系促进了“属+种差”释义法的成熟;语料库语言学的出现,催生了《柯林斯》整句释义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语料库语言学,就没有整句释义法。如今的词典释义已经走过了粗粒度的、笼统释义阶段(以随文释义和同义词释义为代表),正朝着精细化、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发展。此时的词典释义,尤其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但目前还缺少一个这样的理论。究其原因,有三点:

1. 词典编纂者理论意识淡薄,“没有证据表明词典编纂者现在比过去得到更好的培训”<sup>[6]323</sup>,“即使是最好的词典编纂者,当被追问时,也从来无法解释他们在做什么,或为什么在做”<sup>[12]5</sup>。“几千年来,尤其是近现代,语言学理论在不断翻新,而词典学家却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词典编纂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使词典学研究远远落后在

了语言学的后面”<sup>[20]272</sup>。

2. 缺少既熟悉语言学理论又乐于从事词典编纂工作的复合型人才。历史无数次的证明,精品词典都是在词典学家和语言学家通力合作下编写出来的,比如《牛津英语词典》(历史比较语言学家和词典学家合作)、《柯林斯》(以辛克莱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和词典学家合作)、《现代汉语词典》(以吕叔湘为代表的语言学家和词典学家合作)。但像吕叔湘、辛克莱这样的既懂语言学理论又乐于从事词典编纂实践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更常见的情况是,“语言学者和词典编纂者各行其是,互不理睬”<sup>[4]375</sup>。由此造成了语言学理论迟迟不能进入词典学领域、迟迟无法指导词典释义实践的令人痛心的局面。

3. 词典释义是一项复杂的工作,需要多种理论的支持,一种理论往往只能解决释义一方面的问题。比如,原型理论解决释义的典型性问题,释义元语言理论解决释义用词问题,语义分类理论解决被释词的语义类属问题,论元结构及框架语义学理论解决动词的释义问题,物性结构解决名词的释义问题,语义场理论主要解决同义词的词义分析问题,语料库语言学理论解决被释词的用法问题等。如何构建一个涵盖以上多种理论的多元释义理论体系,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二) 实践上的困境

根据释义难度的不同,学者们将被释词分成三类:名词是最容易解释的类<sup>[6]171</sup>;动词、形容词是不太容易解释的类,因为它们的意思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搭配对象;功能词或虚词是几乎不能解释的类,因为目前的词典“还不大知道该如何处理它们”<sup>[6]118</sup>。比如 because(因为),《牛津》系列词典采用传统的方式释义, because(因为)表示 for the reason that(由于……的原因);《柯林斯》从用法入手进行释义, You use because when stating the reason for something(你在陈述事情原因的时候用 because);《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以下简称《现汉》)根据它的句法位置和功能来释义,“表示接在后面的部分是原因”。以上分类大体反映了各类词的释义难度,但并不绝对。因为:

1. 并非所有的名词都容易释义。所谓的容易释义,适用于自然类名词,因为该类名词有科学的分类体系为参照(比如林奈氏分类体系);却不太适用于人造类名词,因为人造类名词缺少统一的分类体系为参照,解释起来不仅不容易,有时还会

出现很多分歧。比如“电梯(elevator)”,不同词典对它的归类就是不同的,《牛津》归入 machine 类(即属于“机器、机械”),《柯林斯》归入 device 类(属于“设备、装置”),而《现汉》将之归入了“升降机”类(属于“机械设备”)。为解决被释词的语义分类问题,《牛津》《柯林斯》等辞书大都建立了专门的语义分类体系。反观汉语类辞书,目前还缺少这样体系,难以参照分类体系解决人造类词语的分类和释义问题。

2. 并非所有的动词都不容易释义。如果将动词分自主和非自主两个大类,那么,非自主动词通常比较容易解释,不容易解释的往往是自主动词。因为,自主动词的词义构造复杂,除了包含动作及必有论元信息外,还包含意愿、工具、方式、依据、目的、处置、影响等非必有论元信息,解释起来比较麻烦,比如“【走】人或鸟兽的脚交替向前移动”(释义见《现汉》)。相对而言,非自主动词的词义构造比较简单,通常只包含动作和非必有论元信息,因此解释起来较为容易,比如“【沉】(在水里)往下落”(释义见《现汉》)。另外,说自主动词释义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即自主动词多义的情况比非自主动词更常见。根据本文的统计,在现代汉语 6000 多个常用动词中,多义动词 1582 个,85% 以上是自主动词。类似的差别,在多义词内部同样存在。比如,“打”有 24 个义项,其中 23 个是自主动作义项,只有 1 个是非自主动作义项;“放”有 17 个义项,16 个是自主动作义项,1 个是非自主动作义项;“开”有 16 个义项,14 个是自主动作义项,2 个是非自主动作义项……(数据统计基于《现汉》释义)

3. 并非所有虚词都是不可解释的。在虚词的大类中,介词是比较容易解释的类,因为介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比较明显,主要起介引作用<sup>[21]</sup>,即为动作行为或小句引进时间、处所、起点、路径、终点、工具、方式、依据、原因、目的等语义成分。只要弄清介词可以引进哪些语义成分,便可以解释介词的意义。比如“自”“从”“由”,根据语料可

知它们可以为动作行为引进“起点”成分,因此解释为:

【自】②引进动作行为的起点、来源或起始时间。

【从】②引进动作行为时间、处所、范围或变化的起点。

【由】③引进动作的起点、变化的来源。(释义源自《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 3 版)

跟介词相比,助词、副词、连词、语气词等的用法更加空泛、复杂,很多句法语义特点还没有搞清楚。目前的辞书只能初步介绍它们的意义和用法,无法详尽地描述其使用环境、搭配对象、句法语用特点等。要解决这些词的解释问题,需要下大力气一个词一个词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

### 三、难和易的相对性

释义的难和易是相对的。有科学的方法,难词往往也比较容易解释;没有科学的方法,容易的词也未必解释得很准确。比如猫、狗、水果、蔬菜等,现在看来似乎比较容易解释的词,而在 18 世纪之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当时人们对日常事物的认识是混乱的,有些甚至是错误的。林奈(Linné 1707—1778)分类法出现后,这样的情况才有所改观,人们逐渐具备了科学分类的知识和能力,可以参照科学的分类描述或解释日常事物。和猫、狗、水果、蔬菜等不同,“表示亲属关系”的妈妈、儿子、女儿等一直都是难于解释的词,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词典没有解决该问题。比如《现汉》,先用“子女/儿子和女儿”解释“妈妈”,然后又用“母亲/妈妈”解释“儿子”和“女儿”,结果造成了循环释义。《牛津》的情况和《现汉》类似,先用 child 解释 mother 和 son、daughter,随后又用 son 和 daughter 解释 child,不仅有循环释义之嫌,而且也没揭示出 mother 和 son、daughter 的生育或辈分关系。详情见表 1。

表 1 亲属关系词释义比较

	《现汉》第 7 版	《牛津》第 8 版
【妈妈/mother】	〈口〉母亲(有子女的女子)。	a female parent of a child or animal.
【孩子/child】	儿女(儿子和女儿)。	a son or daughter of any age.
【儿子/son】	男孩子(对父母而言)。	a person's male child.
【女儿/daughter】	女孩子(对父母而言)。	a person's female child.

模板释义法出现后,这类问题才基本得到了解决。结合下文的释义不难看出,通过模板释义

【妈妈】〈背/面称亲属词〉称呼人对	跟自己有生育关系的	长辈	女子的称呼。
【子女】〈合成亲属词〉称呼人对			儿子和女儿的合称。
【儿子】〈背/面称亲属词〉称呼人对	跟自己有生育关系的	晚辈	男子的称呼。
【女儿】〈背/面称亲属词〉称呼人对	跟自己有生育关系的	晚辈	女子的称呼。

#### 四、未来的发展趋势

理论上,“几百年现代辞书理论史证明,辞书本身或许没有多少独立的自成体系的理论,而是较多地依靠周边学科的发展和推动”<sup>[22]</sup>序言。“语言学理论,尤其是近来在词汇语义学方面的工作,能够照亮通往更好的词典编纂的路途”<sup>[23]</sup>。作为一种融合了论元结构、物性结构、事件结构、语义类结构等的多元理论体系,生成词库论在名词释义<sup>[24]</sup>、名量词释义<sup>[25]</sup>、形名搭配<sup>[26]</sup>、特殊句式<sup>[27]</sup>、语义信息标注<sup>[28]</sup>、语义分类、新意义产生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解释力,被广泛应用于多种语言的词典编纂及词汇语义资源建设之中。比如,欧盟的两个重大项目——12种语言语义词典项目(SIMPLUE)和多语数据库项目(EuroWordNet)就是在生成词库论的指导下建设的<sup>[29]</sup>。将生成词库论引入词典学领域,用于指导辞书编纂和释义工作,“是一个伟大的起点,但绝不是终点”<sup>[12]</sup><sup>105</sup>。

方法上,“属+种差”法已经取代同义词释义法成为辞书释义的主流方法<sup>[10]</sup>,但该方法在“属”和“种差”的确定方面及同义词、多义词、新词的释义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辞书释义不准确、不完备的情况还比较常见<sup>[30]</sup>。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模板释义法可以解决“属+种差”法解决不好或不好解决的问题,在亲属称谓推理<sup>[16,31]</sup>、名名组合释义<sup>[17]</sup>、辞书释义<sup>[32-36]</sup>、多义词以及同义词区分<sup>[18]</sup>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强大的优势,可以作为“属+种差”释义法的有益补充。

实践上,学者们从不同领域论证了“用一个模板解释一批词的意义”思想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限于篇幅,本文只列举三个领域的证据:1)训诂学领域,王宁<sup>[37]</sup>、王东海<sup>[38]</sup>发现古汉语训释材料中广泛使用同一种释义方法,即以“主训词+义值差”为代表的义界法。如果以语义场而不是以词为单位将该方法扩展到了整个词义系统,可以将训诂材料关联起来,有助于准确地区分和把

法解释亲属关系词,不仅可以避免循环释义,而且揭示出了妈妈、儿子、女儿之间的辈分关系<sup>[16]</sup>。

握古汉语词义。比如“酣”“醉”“醒”,《说文》解释道:“酣,酒乐也”;“醉,卒也。卒其度量而不至于乱也”;“醒,病酒也”。由于《说文》缺少语义场的观念,无法系统地把握这些词的语义共性(主训词)和个性(义值差),因此难以将之直观地区分开来。从语义场的角度看,三个词的语义共性(主训词)都是饮酒,差别在于饮酒的“量”以及达到该“量”的后果(义界差)不同:“酣”达到了饮酒最舒服的量但未到醉酒的地步,“醉”达到了饮酒的限量但未到乱性的地步,“醒”超过了饮酒的限量并到了身体不舒服的地步<sup>[39]</sup><sup>103</sup>。这样,通过义界法就将不同词义联系到了一起,实现了同一语义场中不同词义的统一区分和描述。2)词汇语义学领域,冯海霞和张志毅<sup>[40]</sup>、张志毅和张庆云<sup>[41]</sup><sup>367-374</sup>等提出了“同场同模式”原则(解释同一最小语义场的词,释义模式相同)和“同类同模式”原则(解释同一词类的词,释义模式相同)。比如“父亲”“母亲”,它们同属于一个语义场,可以共用一种释义模式,即:

【父亲】有子女的男子是子女的父亲。

【母亲】有子女的女子是子女的母亲。

再比如,名词、动词、形容词的词类不同,释义模式不同。但在同一词类内部,释义模式是相同或基本相同的。解释名词,多用“个体义素+共性义素”的定义式或变式;解释动词,多用“个体义素+核心义素”的说明式或其变式;解释形容词,大多用“个体义素+核心义素”的描写式或其变式,比如“形容……”“……的”等(持类似看法的还有符淮青的《词义的分析和描写》)。3)在认知语义学领域,章宜华认为<sup>[42]</sup>,同一范畴词项共享一个概念图式,不同词项凸显了概念图式的不同方面。比如,communicate 范畴共享 to express 图式,pronounce 凸显概念图式的“词的正确生理发音”方面(图式成分 a),say 凸显“用话语表达思想或观点”方面(图式成分 b),speak 凸显“用声音表达”方面(图式成分 c)。等等,详情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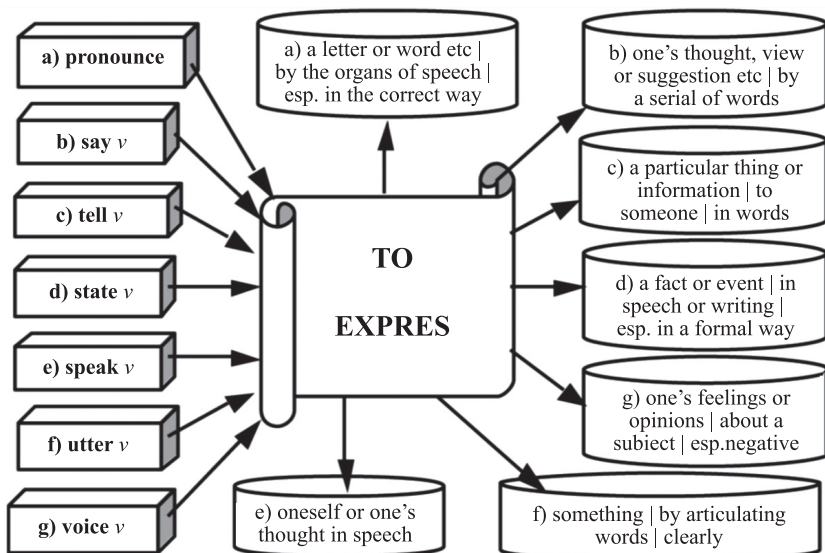


图1 Communicate 范畴的概念图式及其各成员凸显的方面

## 参考文献:

[1] 谭景春. 名名偏正结构的语义关系及其在词典释义中的作用[J]. 中国语文, 2010(4).

[2] Johnson S. 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M]. London: Longman, 1755.

[3] 雍和明, 罗振跃, 张相明. 中国词典史论[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4] 贝戎. 英语词典编纂史[M]. 袁安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5] 张传官. 关于《苍颉篇》第一章的复原[J]. 中国语文, 2019(5).

[6] Landau S I. Dictionaries; the art and craft of lexicography [M]. Cambridge: The CUP, 2001.

[7] 邹鄞. 论《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初稿)对现代词典学的贡献[J]. 辞书研究, 1998(3).

[8] 韩艳英. 《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同义词释义研究[D]. 淄博: 山东理工大学, 2015.

[9]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全集: 第1卷[M]. 苗力田, 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10] 章宜华. 学习词典释义结构与释义方法初探——英、法、汉语学习词典的对比研究[J]. 外国语, 1999(3).

[11] Wierzbicka A. Lexicography and conceptual analysis [M]. Ann Arbor: Karoma Pub, 1985.

[12] Durkin P. The Oxford Handbook of Lexicograph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 尼古拉斯·布宁, 余纪元. 西方哲学英汉对照词典[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4] 吕叔湘. 《现代汉语词典》编写细则(修订稿) [C] //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

语词典》五十年.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5] 谭景春. 谈谈词典释义的三条基本原则——以《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释义修订为例[J]. 辞书研究, 2015(2).

[16] 陈振宇, 袁毓林. 汉语亲属关系的语义表示和自动推理[J]. 中国语文, 2010(1).

[17] 魏雪, 袁毓林. 基于语义类和物性角色建构名名组合的释义模板[J]. 世界汉语教学, 2013(2).

[18] 王恩旭, 袁毓林. 机器词典释义模板的建构和运用[J]. 中文信息学报, 2018(1).

[19] 张志毅. 辞书强国——辞书人任重道远的追求[J]. 辞书研究, 2012(1).

[20] 布龙菲尔德. 语言论 [M]. 袁家骅,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3/1997.

[21] 陈昌来. 介词与介引功能 [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22] 张志毅. 视学术为生命 [M] // 王东海, 王丽英. 汉语辞书理论史热点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23] Atkins B T S. Then and now: competence and performance in 35 years of Lexicography [C] // Proceedings of the Tenth EURALEX International Congress (EURALEX 2002). Copenhagen, Denmark, August, 2002.

[24] 李强. 生成词库理论与名词语义的结构描述和概念解释 [M] // 语言学论丛(五十九).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25] 王恩旭. 基于释义模式的汉语名量词再分类 [C] // 新时期的汉语研究与辞书编纂暨庆祝《辞书研究》创刊四十周年学术研讨会.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9.

[26] 宋作艳. 形名搭配中一价名词的隐含[J]. 励耕学刊(语言卷), 2013(1).

[27] 周韧. 汉语语法中的“消失现象”与“消失角色”

[J]. 汉语学报, 2020(2).

[28] 宋作艳, 赵青青, 亢世勇. 汉语复合名词语义信息标注词库: 基于生成词库理论[J]. 中文信息学报, 2015(3).

[29] Ruimy N, Gola E, Monachini M. Lexicography informs lexical semantics: the SIMPLE experience [C] // Bouillon P, Busa F. The Language of Word Mean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30] 施春宏. 词义结构的认知基础及释义原则[J]. 中国语文, 2001(2).

[31] 卢达威, 袁毓林. 亲属关系推理系统研究与实现[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11).

[32] Svensén B. Practical Lexicography: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Dictionary-Making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3] 夏立新. 英语学习词典中动物类词目词释义的改进[J].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07(3).

[34] 冯海霞, 卢东民. 语文词典中动物词条系统释义的考察及释义模式的优化[J]. 辞书研究, 2011(6).

[35] 王恩旭, 袁毓林. 词义中物性角色的分布及其对词语释义的影响[J]. 外国语, 2018(2).

[36] 王恩旭. 双音复合词的词义构造形式及其对辞书释义的影响[J]. 辞书研究, 2019(5).

[37] 王宁. 单语词典释义的性质与训诂释义方式的继承[J]. 中国语文, 2002(4).

[38] 王东海. 应用训诂学的训释与语文辞书的释义[J]. 辞书研究, 2005(3).

[39] 王宁. 训诂学原理(第二版)[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40] 冯海霞, 张志毅. 《现代汉语词典》释义体系的创建与完善——读《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J]. 中国语文, 2006(5).

[41] 张志毅, 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与词典编纂[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7.

[42] 章宜华. 基于范畴图式—示例关系的释同与解异探析——英语学习词典范畴化释义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7(2).

##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finition Methods of Dictionary

WANG Enxu<sup>1</sup>, GUO Zhihui<sup>2</sup>

(1. School of Literature, Jinan University, Jinan 250022, China;

2. Center for Teaching Research and Assessment,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Before defining a word, the theory and method should be firstly determined.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dictionary for more than 2000 years, the definition method has generally gone through five stages: contextual definition, synonym definition, “genus + species difference” definition, whole sentence definition and template definition. Up to now, the method of “genus + species difference” has developed into the most common and important one in dictionary defini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deficiencies in determining “genus” and “species difference” and in defining synonym, polysemy, neologism and so on. Studies show that the method of template definition can b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one of “genus + species difference” definition.

**Key words:** dictionary; definition method; development dilemma; template definition

(责任编辑 梅 孜)